

国际化社区治理研究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王 名 杨 丽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朝阳区是北京市境外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探索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动员与社区参与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国际化社区治理需要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党政资源优势,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引入契约合作模式,推广“三社互动”,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关键词] 国际化社区; 治理; 朝阳区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1) 04-0063-07

国际化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社区中境外人士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社区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环境设施趋向国际标准,包容各类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的城市社区。国际化社区是城市国际化所带来的移民国际化的结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进入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国际化社区建设成为社区治理的一个新问题。做好国际化社区建设工作既是拓展城市功能定位和深入推动建设世界城市、国际都市等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落实“十二五”规划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境外人士较为集中的北京市朝阳区为例,探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相关问题。

一、朝阳区国际化社区的基本情况

朝阳区是北京市境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根据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北京市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 107445

人,其中居住朝阳区的最多,有 6.2 万人,占 57.7%。如果将在朝阳区工作与旅游的境外流动人口计算在内,则朝阳区外籍人士占北京市外籍人士的比例为 60% 以上。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截至 2010 年底,北京市常住境外人口为 12 万左右,其中 44% 居住在朝阳。依据 2010 年 3 月朝阳区人口数据,朝阳区常住境外人口为 5.4 万,城市与农村的境外常住人口分别为 39502 人和 14346 人,境外人口分别占城市与农村人口总量的 1.74% 和 0.71%。平均而言,境外人口占朝阳区人口总量的 1.25%。

朝阳区 23 个街道的人口总量、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境外人口各不相同,214 个社区的差异更大。23 个街道中,境外人口千人有 12 个,前五位是望京、双井、东湖、麦子店和呼家楼街道(表 1),亚运村的外籍人口位列第十九。按境外人员占辖区人口比例排序,位列前五位的则是望京、麦子店、东湖、呼家楼、双井。

[收稿日期] 2011-06-01

[作者简介] 王名(1959-),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丽(1973-),女,湖南涟源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办委托课题(041505082)

表1 2010年3月朝阳区城市人口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序号	街道	户籍人口			外来人口			境外人员	总计
		合计	本区户籍	人户分离	合计	已办理暂住证	未办理暂住证		
1	望京	169473	68986	100487	81663	80945	718	12901	264037
2	双井	71515	69188	2327	46399	44834	1604	3577	121491
3	东湖	50678	25231	25447	29849	28982	867	3223	83750
4	麦子店	26687	20890	5797	38508	32944	5564	3037	68232
5	呼家楼	64496	62766	1730	22799	21781	1477	2866	90161
6	建外	68821	41718	27103	29702	27465	5000	2088	100611
7	八里庄	95939	80588	15351	28267	30862	1059	1954	126160
8	大屯	67605	62224	5381	68438	64931	3635	1248	137291
9	左家庄	70153	66772	3381	28914	27730	1184	1200	100267
10	六里屯	66656	59857	6799	29086	29063	589	1100	96842
11	三里屯	43912	38557	5355	23184	22023	1308	1079	68175
12	朝外	50121	45570	4551	23932	23615	1871	973	75026
13	酒仙桥	70367	68980	1387	24720	24508	212	764	95851
14	小关	50832	46469	4363	24603	23970	633	733	76168
15	劲松	70951	68612	2339	40712	34640	6072	643	112306
16	和平街	103868	98068	5800	26576	25822	762	604	131048
17	香河园	39616	34032	5584	20712	20204	508	383	60711
18	团结湖	37313	37024	289	10552	9302	1250	353	48218
19	亚运村	51634	47447	4187	43761	39219	5507	350	95745
20	潘家园	85964	80273	5691	44322	42374	1948	211	130497
21	安贞	53671	48592	5079	22131	21781	350	137	75939
22	机场	40792	24088	16704	5973	5862	111	45	46810
23	垡头	53885	25635	28250	15308	14898	410	33	69226
合计		1504949	1221567	283382	730111	697755	42639	39502	2274562

备注: 1. 人户分离人口: 专指居住在本地、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其他区县人口。2. 外来人口包括办理和未办理暂住证的。3. 未办理暂住证人数, 数据源自区流管办和区社会办。

数据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朝阳区社会办。

外籍人员来自全球各国。除了我国的港、澳、台人员外, 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人数较多, 英语是境外人士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随着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推进, 朝阳区在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通过健全地区管理委员会制度, 进一步理顺职能部门与街道的关系。如: 将大街绿化、保洁等工作移交给专业部门管理, 对工地安全、人防安全管理实行“费随事转”等。二是构建两级为民服务体系。在街道层面设立“为民服务大

厅”，在社区层面设立“社区服务站”，综合协调行政、市场、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打造社区便民生活“一刻钟服务圈”，不断提升、规范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三是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培育和发展草根社会组织，采用委托式经营、项目化管理模式，不断探索社会协同工作机制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社会化运作的模式。

朝阳区社区建设的基础差别很大。下面以麦子店、亚运村、三里屯、建外、望京五个国际化社区试点街道为例，进行具体地比较。

第一，各街道人口，尤其是境外人口占住区的比例差别很大。朝阳区公安分局2010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望京街道的境外人口最多，约1.3万，境外人士占街道人口的比例最高，约5%，境外人士中80%以上为韩国人；麦子店街道居第二，境外人士为3037人，人口占比为4.5%，尽管数量与望京有较大差距，但人口占比差别不大；建外、三里屯的常住境外人士不多，分别为2088人和1079人，人口占比为2.08%和1.58%，建外商务人士比较集中，三里屯外交人员及其随从与家属较多；亚运村的境外人士仅为350人，境外人士人口占比只有0.37%。

第二，基于人口构成，各试点街道的社区建设基础差别更大。麦子店是全市较早提出国际化社区理念并进行探索的街道，在硬件设施、资金投入、信息技术与科技利用、软件建设、社区宣传等方面均有较好的基础；三里屯尽管没有较早提出国际化社区的称谓，但一直在不断地调适与改善酒吧街的管理与服务，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社区建设基础；望京新城是一个较新的街道，境外人士主要是韩国人，良好的规划与硬件设施，加上较好的服务意识、规范意识与乐于投入，望京正在积累很好的后发优势；建外号称CBD区域中的中心，先进、完备的商务及其配套设施，为国际化社区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硬件环境；亚运村境外人员少，社区设施相对陈旧，社区居民中老年人、残障人士占一定比例，硬件基础比较薄弱，国际需求并不明显，但街道与社区居委会、服务站的管理者们都积极尝试国际化社区试点，

大力提升社区管理水平。

尽管基础各不相同，但在讨论、探索或推进国际化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这五个国际化社区试点街道均有硬件软件两手抓、倡导低碳、关注境外人士的需求、鼓励参与的社会动员等良好的社区建设理念，也各自根据社区实际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落实措施和行动。

二、国际化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 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厚， 社区自治力量不足

我国的社区管理一直实行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但长期以来，居委会承担政府事务过多，实质上成了政府的“腿”，影响了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社区服务站的成立与运营，分担了许多原来由居委会承接的工作，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有些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责不清，再加上交叉任职，以及同样的任务不同的工作视角，使得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责往往难以厘清。另外，传统街道-居委会体制，使街道与居委会在多年合作中形成了路径依赖，双方互相习惯了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模式，较少思考是否存在更合适、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对于国际化社区中的境外居民、境外机构、境外单位，不管是街道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服务，通过服务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很多，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挑战是语言，新进社区工作者中有一部分通过了国家英语四、六级，但能用英语流畅交流的很少，年长的用英语交流就更困难，有针对性的多语种服务更是奢谈。第二个挑战是境外人士处于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尤其是高端公寓的智能管理又为境外人士与社区的交往设置了一道屏障。尽管可以请求物业的协助，但第三方的转达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不够直接、深入。第三个挑战是社区居委会传统的入户工作方式在国际化社区寸步难行，一方面是楼门进不去，另一方面是即使有机会进楼门，因为文化习惯不同，境外人士保护私人空间的意识比较强，难以接受工作人员入户。这几个挑战影响了社区了解境外人士需求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当前的社区“政府功能”还没有弱化,居委会自治功能没有强化。这使得许多境外人士感觉与其本国居住的社区差别较大,他们普遍反映现在居住社区的居委会工作方式比较生硬,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境外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融合。

2. 社区服务设施未尽其用,

按需服务任重而道远

2008年6月底之前,朝阳区各街道、社区依据《朝阳区街道系统建设国际化、开放型窗口社区工作实施方案》和《朝阳区街道系统建设国际化、开放型社区达标标准》,完善了社区的双语标识、公共服务设施、接待场所等相关硬件设施建设。而文明社区、星级社区、和谐社区、安全社区、国际安全社区的创建,使得奥运后的社区硬件服务设施更加齐备。有些社区的办公、活动场所等比街道的还要好。但是配备有形设施、制定规章制度并不难,难的是制度落实,按需服务。

街道与社区都有对于设施使用情况的统计,但暂未发现有街道或社区对设施的使用效率进行专门分析。设施的使用制度与流程可能并不为广大社区居民和组织所知晓。比如,街道图书馆与社区图书室,平均每天不超过20人次,境外读者大概一周左右一人次,而且读者管理还是“年月日和签名”的传统登记方式,没有读者阅读偏好、借阅频次的统计,更没有广泛的需求研究与分析,以及更进一步的专业而人性的社区图书管理。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社区图书馆是社区交流的平台,几乎每个家庭都会经常使用。相较而言,尽管我国各社区目前均有自己的网站或博客等,但与社区成员总数相比,参与者还是少数。不少网站有浏览统计功能或设计网站修订反馈调查问卷,但少有社区对浏览对象、浏览原因、关注重点、需求收集的效度与广度、修订意见进行切实细致地分析,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与行动。

各窗口单位、街道服务大厅、社区服务站都有能用外语交流的工作人员,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窗口,还有的设置了境外人员服务站,而且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与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化社区建设。但这些服务主要还是“守株待兔型”,针对

性与动态性不够,对于外国习俗与文化了解不够。知晓国际礼仪、理解国际文化、提升服务品质,不仅是窗口工作人员的职责,而且也是每一位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居民与组织的职责,否则中国形象、北京印象、朝阳印象都会大打折扣,影响中外居民的社区融合。比如,曾有外籍志愿者正在上英语课,有参观团体径直走入课堂,如入无人之境,高声喧哗,甚至不顾课堂需要,擅自拉开窗帘摄影留念以做宣传。该外籍志愿者非常生气,明确表示:以后只要是社区的宣传性活动,一概拒绝。本来她已开始融入社区,但因为这一事件处理不当,使其改变看法,中断志愿活动,大大打击了她服务社区的热情。

3. 社区动员有名无实

社区动员包括街道,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成员三个层次,社区成员包括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社会单位三个主体。总体而言,目前多样化、多层次、因人而异的动员及激励措施还没有建立起来。

社区动员的前两个层次依靠行政的力量,动员效果好一些。但如何遴选有能力的专业工作人员,动员与激励他们热爱社会工作,专心社会工作,创新社会工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在志愿服务方面,尽管每个社区、每个街道都完成了考核指标,但其实只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寻找并录入志愿者的注册信息,系统中存在的仅仅是数据,与社区志愿者队伍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而那些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尽管已成立了志愿者联盟、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分会等组织,有了志愿者注册系统及培训、激励等管理制度与措施,但是,他们对于志愿者的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志愿服务管理混乱,条块分割,缺乏协调;志愿服务项目运作管理不规范,短期行为多;志愿者队伍的招募、培训、管理等缺乏统一标准。总之,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集参与、反馈、评价、奖惩为一体的社会动员与志愿服务体系。

社会组织是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推手,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发挥机制。朝阳区是一个相对重视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的地区,但囿于我国现有的社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的参与有限。以境外人士为主的社会民间组织，如台湾同乡会、韩国人联合会、外媒记者协会等，如何通过他们了解境外人士的需求，如何通过社区民间组织与其交流合作，发挥本土与涉外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敏感、艰难却重要的问题。

社会单位是社区的一个重要主体。目前的现状是社区期望社会单位的支持，但对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挖掘不够。为动员社会单位参与社区建设，街道与社区成立了许多协会，如酒店协会、餐饮协会等，基本做法是将本辖区同行业的单位集中起来开会，说明一下情况，少有后续活动，自然也就难有积极的经营与运作。

目前，有的街道已经开始考虑社会单位的需求与利益，联合社会单位的店庆促销等活动实现双赢；有的街道针对企业需求开展人力资源培训。但总体而言，对社会单位的需求与利益了解不够多、不够深，尤其是对涉外单位，更是知之甚少。

三、创新国际化社区建设的思考

1. 基本原则：存量盘活、增量添彩

创新国际化社区的基本原则是存量盘活、增量添彩。存量盘活指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度、资源等条件，基本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制度牵引，机制推动，实现人和社区共同发展。增量添彩指在存量盘活的基础上筹措新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度、资源等条件，为社区创造更多价值，提供更多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与多元需求。

存量盘活是基础。首先要求社区盘点家底，分类整理，然后就效用与潜能予以客观分析与评价，做出守、立、改、废等决策，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建立相应的动态跟踪反馈机制。社区建设的投入既包括有形资本，也包括无形资本。社区建设的产出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更有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等精神与心理效益。

增量添彩是以存量盘活为基础的锦上添花。需要增量资源时首先明确存量资源是否确实不足或能否解决问题、能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是增量可以采用哪些方式、哪种

方式既适合社区实际又可通过存量来延伸，以及增量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实施之后的动态反馈、评价与优化。通过存量资源来扩展新资源，解决新问题，满足新需求，创造新价值，这也是培育社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通过存量盘活与增量添彩来培育社区竞争力和凝聚力，与朝阳区的社区发展战略以及以人为本、持续改进的社区建设理念都是一致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坚持文明社区、和谐社区、星级社区、安全社区、国际安全社区的创建与验收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建设的创新与突破，为社区的中外居民和组织提供更多满足其需要的公共服务，保障其更多利益。

2. 目标模式：每个社区都是国际化社区

每个社区都是国际化社区意味着每个社区的服务管理水平都是一流的，社区资源都是开放共享的，无论在哪个社区生活都很方便，境外人士与本土居民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居住社区，中外成员和谐相处成为一种自然状态。

国际化社区相对本土化社区而言，是混合社区的一种形态。就朝阳区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境外人士比较集中，但境外人口在社区的分布很不均匀，社区资源分布也很不均匀。基本上是境外人士聚居越明显的社区，优势资源越集中；境外人士的阶层越高，优势资源的集中程度越高。其实，不管是麦子店还是望京、建外，社区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居民与中国组织，而社区资源是城市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本应由社区所有成员共享。国际化社区的本质是中外成员和谐居住，如果社区资源一味偏向境外人士，其实不利于境外人士与本土社区的成员接触，而且对其他社区成员也不公平，对社区治理、城市建设也是一种浪费和损失。这样的社区很难说是真正的国际化社区。

真正的国际化社区不仅社区成员有国际性，社区设施、社区服务管理达到国际水准，更重要的是社区具有开放的理念、开放的空间、便利的服务、融合的文化。

人是情感动物，需要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社区应该为此建构便捷的交流平台。上海浦东花木街道的碧云社区是目前国内国际化社区的典型范例。碧云是一个高档社

区,却非常开放,没有围墙,可以随意进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碧云社区有自己的操场与绿地,社区道路比一般的城市道路更为宽敞,社区内免费停放车辆,社区道路专门规划了自行车免费停放带,超市、咖啡厅、游泳池、书店、图书馆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而且都是开放性的。独具匠心的是公共设施的一层设公共走廊,走廊中有随处可见的座椅,墙壁上贴着体现社区文化的照片。暖暖的冬日,在操场、草地、走廊、咖啡厅等场所,大家嘻嘻哈哈地晒着太阳,聊着东南西北,有点像过去的大院子,互相都比较熟悉,即使是初来乍到的新人,也能很快融入其中。

3. 尊重社区差异,建设各具特色的国际化社区

国际化社区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巴黎、纽约、东京、上海等国际化社区管理方式各异。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基础,社区资源也各不相同,朝阳区各试点社区没必要、也很难按统一的模式来建设。政府有统筹整合资源的优势与义务,可以对国际化社区建设做出规划、制定指标体系来引导和监督,但起步阶段不宜过细或单一模式化。国际化社区建设不仅是一个创新工程,还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单纯为了追求管理的精细化,一开始就设定过细的条条框框,社区极易陷入疲于应对指标、考核的泥潭。这样很容易束缚社区的创造性,国际化社区建设就难有突破,难有创新。因此,制定规划与指标最好是原则性与鼓励性的。

总之,既体现出社区的自身特点又能满足社区中外成员的需求和利益的社区建设,才是最具中国特色、朝阳特点的国际化社区建设。

4. 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健全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

实践表明,社区建设和治理是动态的、发展的,目标是构建起社区内体现党、政府、社会三者有机统一的治理结构,形成涵盖党组织、政府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流动人口、各类群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按照

这一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已经在社区治理结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上初步实现了“打基础、有突破”的目标。下一步,关键是要以国家与各省市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为契机,抓好各项目标的分解落实,进一步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管理服务全覆盖的目标。

5. 引入契约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化、项目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契约合作模式是反映市场规律的基本手段。现代社会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有限的政府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单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机制必须创新,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契约合作模式,是大势所趋。

引入契约合作模式,进行项目化运作,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公共服务,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有效节约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减轻政府公共服务的压力,扩大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围,扩大公民的选择权。而且引入契约合作模式,可以减少政府的寻租设租行为,把官民关系转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关系,公共管理转变为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

当前,朝阳区需要以试行《北京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为契机,集中资金,集合力量,充分运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资源,进一步创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加快公共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对可以由社会组织、企业、志愿组织承接的事项,政府通过项目购买、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多种形式,打造多元化、项目化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

6. 推广“三社互动”,构建以志愿服务为动力源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

所谓“三社互动”,就是在街道、社区层面,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紧密结合,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互动”发展模式。

“三社互动”以满足社区居民各种需求为主线,以加强社区各类协会或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建设为中心,尝试将社区居委会下设机构协会化,将公办社区服务事业市场化,同时以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社区协会为指导,整合、利用社区单位场地、人员、资金等资源,整合、利用各级部门、驻区单位的工作资源,按照居民和社区需求,新建或扩建各类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区、街道、部门调拨的各项事业资金实施项目运作,直接向协会、民非组织、草根社团等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同时,培育社工事务所,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成立以专业社工为核心的各种志愿者(义工)组织,由社工策划志愿服务方案,指导、监督义工开展多种志愿服务,形成“社工引领志愿者,志愿者服务群众,群众参加志愿者”,覆盖基层社区的志愿者服务网络,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的草根志愿服务机制,形成一种政府引导下社区搭台、社团搭载、志愿服务驱动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

参考文献:

- [1] 刘中起.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甘肃理论学刊, 2011 (1).
- [2] 陈雪莲.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北京市鲁谷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为个案 [J]. 华东经济管理, 2009 (9).
- [3] 李海金.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J]. 中州学刊, 2009 (4).
- [4] 温淑春. 关于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的思考 [J]. 理论与现代化, 2008 (3).
- [5] 李福全. 率先开拓社区建设新路子 [J]. 群众, 1999 (2).
- [6] 李凯. 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J]. 中国民政, 2002 (2).
- [7] 徐辉, 丁煜. 论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5 (1).
- [8] 张洪武.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J]. 宁夏党校学报, 2005 (3).
- [9] 刘娴静. 城市社区: 治理与重构 [J]. 党政干部论坛, 2003 (11).
- [10] 俞海滨. 融入本土, 汇聚五洲——国际化社区浅探 [J]. 上海房地产, 2010 (7).
- [11] 茅茂春. 上海国际化社区文化构建思维透视 [J]. 城市开发, 2009 (21).
- [12] 阿兰纳·伯兰德, 朱健刚.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7 (4).
- [13] 郝娟. 解析我国推进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障碍及成因 [J]. 城市发展研究, 2007 (5).
- [14] 刘娴静, 邝凤霞.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 现状与路径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4).
- [15] 吴佳顺. 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研究 [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6).
- [16] 温伦微. 社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中国城市经济, 2011 (5).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Taking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WANG Ming YANG L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where a lot of population from abroad concentrates has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But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erm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community mobiliz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o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hould stick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tivating the reserve and adding colors to the new, take the most advantages of resources of government, optimize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ntroduce contract cooperation model, extend intera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workers and community, achieve the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haoyang District